

「華北自治運動」中的冀東偽政權

◎ 何立波

1931年之後，在中國土地上陸續出現了偽滿洲國、偽蒙疆自治政府、華北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汪偽等幾個偽政權。在這幾個偽政權中，以殷汝耕建立的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勢力最小，僅維持了兩年多時間就被拋進歷史的垃圾堆，成為一出鬧劇。而對這一歷史事件，目前還缺乏深入的研究。

一 日本侵略者的「華北自治運動」

冀東偽政權的建立，是適應日本當局「華北自治運動」的產物。華北地區包括冀、察、綏、晉、魯五省和平、津兩市，在政治、軍事和經濟方面都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關東軍認為：「在華北可以很容易地建樹起第二個滿洲國」¹。1933年11月，日本內閣在「帝國外交政策」最後修正案中明確提出要「支持中國大陸之分治活動，驅逐國民黨勢力於華北之外」²。

1935年，「華北自治運動」進入了關鍵階段。這年，通過《秦土協定》和《何梅協定》，日本實現了對冀察兩省的覬覦。國民黨中央勢力退出了冀察兩省，察哈爾省的主權實際上已經喪失。由此，實現了分離華北的第一步計劃。繼之，日本又開始策動華北五省（河北、山東、山西、綏遠、察哈爾）「自治運動」。從1935年4月開始，日本侵略者就積極策動「華北自治運動」。同年9月，繼梅津美治郎之後出任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的多田駿召集日本記者，散發了名為《日本對華之基礎觀念》的小冊子，計劃成立「親日、反蘇的華北五省組成聯合自治體」，開始公開鼓吹「華北自治」。同年10月，在日本內閣通過的「廣田三原則」中，日本重申了在華北尋求特殊體制的意向。

二戰後遠東國際法庭證據第3317A號記載的證人田中隆吉的證詞說：「一九三五年四月，我是關東軍的參謀，負責所有自治運動的電訊工作。自治運動的主張，是由關東軍司令南次郎和華北日本派遣軍司令梅津在這個時候決定的。這個運動的目的，是在內蒙和內蒙以外的華北地區製造自治政權。」³

1935年10月中旬，關東軍的老牌特務、關東軍瀋陽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來到到華北策動「華北自治」運動。土肥原知道，要一下子讓華北的主要勢力宋（哲元）、閻（錫山）、韓（復榘）、商（震）四人都連袂反蔣，難度極大，而首先從冀東殷汝耕那裏獲得突破，則可以借此向華北其他勢力派人物施以壓力。為此，土肥原擬訂了一個詳細的計劃：「第一步先說服並切實掌握殷汝耕；第二步，在宋（哲元）、閻（錫山）、韓（復榘）、商（震）四人中選擇突破口，首先切實掌握其中之一人，使之與關東軍結合起來成立一個新政權；第三步再將其他三人包括進來。」

鑒於駐平津冀北察哈爾的國民黨第二十九軍軍長兼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掌握著平津地區這一華北的政治經濟中心，地位舉足輕重，「華北自治運動」的整個工作，實際上是以宋哲元為中心的，這一點得到關東軍司令部和華北駐屯軍司令部的認可。土肥原向宋哲元提出在華北五省二市建立以宋哲元為首、以土肥原為顧問的「華北共同防赤委員會」。與此同時，日本關東軍在山海關、海軍在青島集結待命，向宋哲元施加壓力。

當時中國的抗日救亡運動正高潮迭起，具有一定愛國思想的宋哲元，沒有接受土肥原的要求。早在1933年3月，日軍在侵佔熱河後繼續向長城各要塞進犯。二十九軍掀起了著名的「長城抗戰」，讓本為雜牌軍的二十九軍一下子名震全國，成為著名的愛國部隊。在日軍的步步威逼之下，宋哲元處境維艱，一度產生動搖思想。宋哲元並不甘作日本的傀儡，但又孤立無援，無力獨自抵抗日本，故而態度非常曖昧。

為了不激怒國民，蔣介石於1935年11月20日拒絕了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提出的要他承認「華北自治」的無禮要求。蔣介石指出：「所謂華北自治運動多是日方策動，中國方面並無此事」，「中央自無以實力壓迫之事」。兩天後，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唐有壬奉命向有吉大使正式申明：中央絕對不能承認華北所謂的「自治」運動，而且要求日本「應速令土肥原離開華北」。

而在日本方面，日本外務省和關東軍在這個問題上也有不同意見，日本外交部門擔心英美的干涉，不同意關東軍以武力強制推行華北分離的主張。在這種情況下，土肥原爭取宋哲元的工作沒有取得突破。

在宋哲元那裏沒有收穫的情況下，為了首先在「華北自治」方面有所突破，土肥原就先在冀東地區扶植了以漢奸殷汝耕為頭目的「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並繼續向宋哲元施加壓力。儘管殷汝耕的威望遠不及宋（哲元）、閻（錫山）、韓（復榘）、商（震）人，但是畢竟有了進展。日本人古屋奎二所著的《蔣總統秘錄》指出：「土肥原賢二一幫人的詭計，顯然是要以所謂的『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先打開一個缺口，然後更進一步擴大『華北自治』的範圍。」⁴

二 「日本通」殷汝耕

殷汝耕，浙江平陽人，早年曾留學日本，畢業於東京早稻田大學經濟系，娶日本女子為妻。通過其妻，殷汝耕與日本軍政界建立了聯繫。1916年回國後，殷汝耕先在北洋時期的國會中任秘書，後轉南方軍政府任駐日特派員。1925年，他參加郭松齡的反奉事件。郭松齡反奉失敗後，殷汝耕隻身逃入日本駐新民縣領事館，請求保護，這才僥倖活命。

殷汝耕對日本軍國主義很有好感，曾多次參與對日交往，與殷同（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建設督辦）、袁良（曾任北平市長）、程克（曾任天津市長）並稱日本通四巨頭。無論是在日本還是在中國，殷汝耕都保持著穿和服、講日語和手挽日本妻子的形象。殷汝耕從日本回國後，便開始在各軍閥之間進行投機活動，並把蔣介石當成了自己的靠山。當蔣介石有意與日本人談判時，殷汝耕便出面充當蔣介石的特使，與日本人進行周旋。

1928年5月，日本在濟南製造了「五·三慘案」。當時殷汝耕正負責對日交涉，他採取妥協退讓的政策，遭到國人的唾罵。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殷汝耕竭力為南京政府的對日屈辱外交效勞。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殷汝耕以上海市政府參事的身份，受上海市長吳鐵

城委派，參與了《淞滬停戰協定》的談判工作。1933年日軍進攻熱河期間，殷汝耕被國民黨親日派、新政學系首領之一的黃郛派到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專門辦理對日交涉事宜。殷汝耕參與了《塘沽協定》的談判，並以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參議身份參加了該協定善後處理的會談。此間，殷汝耕的表現深得日本方面的賞識。

1933年5月《塘沽協定》簽訂後，國民政府在冀東成立了「薊密區」和「灤榆區」兩個行政專員公署。「薊密區」公署設在通縣的孔廟，「灤榆區」公署設在唐山。殷汝耕任「薊密區」專員，陶尚銘任「灤榆區」專員。不久，陶尚銘因為沒有對日本人言聽計從而被免職，「灤榆區」專員也由殷汝耕兼任。從此，殷汝耕獨攬了整個冀東地區的軍政大權。任職期間，殷汝耕勾結日本商人，對日本的走私活動予以掩護。對日本運來的商品，殷汝耕只徵收象徵性的進口稅，使得日貨源源不斷地流入內地。由此，殷汝耕由此開闢了一條滾滾財源，也密切了日本人和殷汝耕之間的關係。

三 對於成立「自治政府」，殷汝耕比土肥原還積極

為了實施「華北自治」，日本方面和炮製偽滿洲國的手法如出一轍，即收買小部分漢奸，強姦民意，憑空捏造出「地方自治」的假象，在刺刀威脅下實現「自治」，進而在刺刀控制下完成「獨立」。

1935年10月間，日本駐天津特務機關長大迫通貞，授意漢奸武宜亭等人在河北香河縣發動暴亂，製造出「自治」是出於「民意」的謊言。在日本人的授意下，10月18日，武宜亭等以反對苛捐雜稅為名，在香河縣安撫寨村胡承武家召開了「國民自救會」，準備暴動。20日，武糾集了一千餘人，打著白旗，包圍了香河縣城。22日，在日本憲兵的督戰下攻進香河縣城。佔領縣城後，日方安排安厚齋為香河縣長，成立了親日政權。這次漢奸暴動，因發生在香河，故稱「香河事變」，又因參加者手持白旗，亦稱「白旗事變」。

為了趁熱打鐵，土肥原爾後便向冀東地區主要負責人殷汝耕提出，由其在冀東主持「自治」。殷汝耕顯得興奮異常，欣然從命，決心遠遠超出了土肥原的估計。

11月23日夜，殷汝耕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家飯店召開了會議，秘密討論「自治事宜」。土肥原親自到會，給眾漢奸打氣。土肥原要求殷汝耕立即宣布「自治」。殷汝耕馬上表示，會後就返回薊密區公署所在地通州，宣布成立「自治政府」。據土肥原的助手專田盛壽回憶說：

「在殷汝耕發表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宣言前夕，我和土肥原來到天津某一飯店，那裏已聚齊了殷汝耕以下的主要人員，土肥原要求他們起事。意氣高昂的殷汝耕立即說：『好事要快辦，明天就宣告新政府成立，今天晚上我們立即返回通州。』土肥原大為高興，讓我馬上去拿香檳酒，並說：『那麼我們就以香檳酒預祝成功吧！』」但是不巧，當時飯店中的香檳酒已賣光。於是專田盛壽建議用日本酒代替，殷汝耕馬上說：「用日本酒比香檳酒還好。」殷汝耕的漢奸相，畢露無疑。

11月24日，殷汝耕由天津返回到通州。當天，殷汝耕就召開了由薊密、灤榆兩區各區縣長及香河、昌平、寶坻三縣縣長、各保安隊長參加的會議。殷汝耕宣布將灤榆區與薊密區合併，改稱灤薊區。殷汝耕還當場宣布灤薊區實行「自治」，並以「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發表「宣言」，列舉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六大罪狀」，宣布「自本日起，脫離中央宣布自治，舉聯省之先聲以謀東亞之和平。」⁵殷汝耕也想步偽「滿洲國」的後塵，成立一個所謂的「國」。但在和日本人商議之後，日本有關方面認為殷汝耕的冀東「政權」規格不

夠，殷汝耕只好暫時委曲求全稱「政府」。

同日，殷汝耕還向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晉綏綏靖主任閻錫山、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綏遠省主席傅作義、北平特別市長秦德純、天津特別市長程克、青島特別市長沈鴻烈等人發出通電，稱：「為華北柱石為民眾領袖之諸公，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宜早定大計，借救國家之滅亡而負磐石之重任。」⁶

11月25日，以殷汝耕為首的「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在通州宣告成立。「委員會」為軍政最高負責機關實行會議制，由委員中選舉委員長一人為會議之議長，並負軍政一切責任。在成立大會上，殷汝耕宣布以張慶餘、張硯田、李海天、李允聲、王廈材、池宗墨、殷體新、趙雷等八人為「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委員，殷汝耕為委員長⁷。殷汝耕由此成為關內第一個傀儡政權的頭子。

「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下設四廳三處二局，其設置及負責人如下：秘書長（池宗墨）、民政廳（廳長趙從懿）、教育廳（廳長劉碩援）、建設廳（廳長王廈材）、民政廳（廳長張仁蠡）、外交處（處長崔實，一說霍實）、保安處（處長張慶餘）、稅務管理處（處長未定）、鐵路管理處（處長未定）⁸。同日，殷汝耕還宣布，該會自即日起辦公，所有薊密、灤榆兩區行政專員公署同時停止辦公，限月底結束，並將薊密區專員公署牌撤換，換成「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牌匾。

11月25日是殷汝耕非常忙碌的一天，可謂「神采奕奕」。據採訪他的《滿洲報》記者報導說：殷汝耕「自二十四日晚乘汽車由天津抵通州以來，因舉行幹部會議、招集全縣長等，絲毫未得休息，但精神極佳。」⁹

四 國民政府的曖昧和冀東偽政權的囂張

殷汝耕的冀東偽政權剛一成立，就受到全國各界的強烈譴責。冀東人民對此極為憤慨，11月27日，偽「外交處長」崔實迫於民眾壓力，在北平宣布脫離偽政權，後返回南京。偽政權所轄的二十二個縣的縣長，也聲明反對殷汝耕的賣國行徑。

殷汝耕偽政權的成立，給國民政府以很大的震動。1936年1月21日，日本外相廣田宏毅在日本議會發表演說時指出：「冀東自治宣言嚴重刺激了南京政府，該政府視殷汝耕為國賊。」¹⁰ 1935年11月26日，國民政府行政院召開會議，決定撤銷了軍委會北平分會，委派何應欽為行政院駐北平辦事處長官，直接處理華北事務；委派宋哲元為冀察綏靖公署主任；下令河北省政府將灤榆專員殷汝耕免職拿辦；同時撤銷灤榆薊密兩區專員公署，其職務由河北省政府直接處理¹¹。同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決定通緝捉拿殷汝耕。國民政府還下令河北、平津當局，不可承認冀東偽組織，但同時要求他們不可引起非軍事區的糾紛。國民政府還要求宋哲元除了對殷汝耕的行動給予注意外，對於其他的一切則要謹慎從事，隨時請示，不可擅作主張。

對於南京國民政府的「通緝令」，日本方面表示了不滿。11月27日，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就此拜訪國民黨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長孔祥熙，表示反對國民黨中央政府對華北所採取的措施，反對國民黨中央政府懲辦殷汝耕。

在成功策動殷汝耕「自治」之後，土肥原加緊策動宋哲元。宋哲元雖不願意當漢奸，但是也

以此為籌碼向蔣介石討價還價。經過宋哲元、日本及南京國民政府之間緊張的三角交涉，國民政府雖也曾力爭保留主權，但在妥協退讓政策下，提出並得到日本的勉強同意，於12月28日宣布在北平成立了半獨立性質的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宋哲元為委員長，土肥原擔任冀察政務委員會顧問。

土肥原在向關東軍司令南次郎彙報工作時說：「以殷汝耕為首的冀東政權和以宋哲元為首的冀察政務委員會，雖然未能完全滿足關東軍的要求，但這兩個政權卻可以服從關東軍命令。將來的華北政權可以利用冀察政務委員會作它的核心。」¹²

關東軍參謀田中隆吉證實：「在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以後，土肥原就當上了它的最高顧問，完全按照日本的企圖，指導著這個委員會的政治和經濟。」

冀察政務委員會除了名義上隸屬南京國民政府，實質已經成為變相的自治，但也不是日本所希望的完全「自治」。二戰後遠東國際法庭證據第211號指出：「這個政權組織雖然不是完全脫離南京政府，卻是準備與日本合作的。」¹³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後，「華北自治」告一段落。

面臨日本方面的步步緊逼，宋哲元不得不作出妥協和讓步。他上任後，立即任命張允榮、張壁、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驥、陳中孚、楊兆庚等人為委員，並任命潘毓桂為北平市警察局長，指定陳覺生、潘毓桂等人負責對日交涉。而這些人大多是漢奸或親日派。抱著息事寧人的宋哲元，對冀東事件視若無睹，讓殷汝耕公然在其北平南池子家中設立駐平辦事處。冀東偽政府的大小漢奸在北平的一切活動，亦毫不受遏制。

國民政府的懦弱，讓日本人的氣焰更加囂張，有恃無恐。11月25日，日本方面開始由關外向平津及關內調兵，27日佔領了豐台火車站，並鼓噪天津實行「自治」。

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讓殷汝耕感到有恃無恐。12月25日，根據土肥原的意旨，殷汝耕發表了《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改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宣言》和《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組織大綱》，正式宣布將「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改組為「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自任偽「政府」的政務長官，總攬軍政大權，池宗墨、王廈材、張慶餘、張硯田、趙雷、李海天、李允聲、殷體新等八人為參政。偽「政府」下設三處四廳，即：秘書處兼外交處（池宗墨為處長）、保安處（董鳳祥為處長），民政廳（張仁蠡為廳長）、建設廳兼教育廳（王履材為廳長）、財政廳（趙從懿為廳長）。

在《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組織大綱》的第一條，宣布了偽政府所管轄的區域，包括二十二縣，即通縣、灤縣、臨榆、遵化、豐潤、昌黎、撫甯、遷安、密雲、薊縣、玉田、樂亭、蘆龍、寶坻、寧河、昌平、香河、三河、順義、平谷、興隆。此外，延慶、龍門、赤城、塘沽、大沽等地，也被強行劃入轄區¹⁴。

鑒於「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成立後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聲，殷汝耕此時心虛了許多。在12月26日的記者招待會上，他說：「本府決修明庶政，貫徹初衷，但不脫離中華民國，故不自製國旗，僅於二十六日通告各國，宣布成立，不要求他國承認，亦不承認他國；唯『滿洲國』因接壤故，事實上不能不發生外交關係。」¹⁵

「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後，與它有「外交關係」的只有日本和偽滿洲國。《日本年鑒》記載說：「這個新政治機構為了維持良好關係，具有和日本和『滿洲國』談判的許可權。」

偽滿洲國與冀東偽政權兩個偽政府惺惺相惜，「壤地相接，唇齒相依，王道樂土，蕩蕩平平，新興氣象，蓬蓬勃勃」。為了「與鄰邦敦睦友誼，並專答關東軍」，1936年4月14日，「中華民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政務長官」殷汝耕，派遣偽政府的秘書長兼「外交處長」池宗墨為「正式使節」，訪問偽滿洲國¹⁶。

池宗墨是殷汝耕的浙江平陽同鄉，早年留學日本，先後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和明治大學，深受殷汝耕的信任，由一個小秘書爬到冀東偽政府的二號人物。池宗墨小人得志，得意洋洋。最初偽政府的「外交處長」為崔實，不願同流合污，在一個會議上向殷汝耕表示「不能幹」。坐在右側的池宗墨當即用左腳踢踢霍實的右腳，無恥地說：「不要再講了，我們都是坐汽車階級（即官僚階層）呀！」池宗墨整個一副小人嘴臉。霍實後來對人說：「池宗墨對我說出這樣無恥的話，真令我痛心。」

此次「出訪」，據雲，池宗墨受到了「日滿官民及各界熱烈歡迎」。池宗墨還拜會了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和關東軍司令官植田。二人皆給殷汝耕回復了書信，植田還送給殷汝耕一柄寶刀，一個清水燒¹⁷。為了答謝冀東偽政權，1936年5月18日，偽滿洲國派遣答禮專使高崇祿、副使李垣一行，專程來到通縣回訪。

1936年5月，殷汝耕成立了偽冀東銀行，總行設於天津，到1937年「七七事變」時發行額為830餘萬元。冀東偽政府中充斥著大批日本顧問，操縱了整個偽政府。冀東偽政府的軍政大權，均被日本人操縱。正如戰後遠東國際法庭在審判土肥原時索指出的：「它（按：『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包括冀東非武裝地帶的二十二個縣，佔面積一萬平方英里。這個地區的資源、工業、關稅完全落入日軍之手，他們並且利用這個地區為販毒、走私的根據地，以及土匪和漢奸的庇護所。」¹⁸

冀東偽政權成立後，對冀東人民進行殘酷的殖民化統治。冀東地區有人口五百萬，該地區收入佔河北省年收入總和的22%¹⁹。冀東各縣均設日本顧問，交通要道和重要城鎮駐守日軍，鄉村實行五家連保制度。偽政府實行經濟掠奪，武裝保護日本人走私，摧殘了這一地區的民族工業。偽政府實行奴化教育，冀東各類學校的教科書，刪去一切帶有民族意識的內容，增設日語，鼓吹「王道文化」。在冀東地區，偽政府還大力推行吸毒、賭博、娼妓「三毒」政策。據1935年底唐山一地統計，因吸毒死於街頭者，每日平均七個人，全年不下二千人。整個冀東地區因吸毒而致死者數以萬計。

冀東偽政權一出籠，便遭到冀東各界的強烈反對。各縣縣長先後聲明「絕不附逆」。偽政府「政務長官」殷汝耕準備從通縣沿長城到山海關「閱邊」，中共遷安縣委發動黨員、群眾沿途張貼「打倒賣國賊」、「打倒漢奸殷汝耕」的標語，迫使殷汝耕改變了「閱邊」線路。1936年12月25日冬，唐山、灤縣等地在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一周年紀念會上，所有被迫到會的中國人均以沉默來對抗，拒絕呼口號、唱「冀東政府」歌，並將歌詞撕毀。群眾咒罵當晚的提燈會是給「冀東政府」發喪會，很多人在半路上將提燈燒毀。中共地下組織領導的抗日遊擊隊，也不斷襲擊日偽據點。

五 七七事變後「通縣事件」爆發，給冀東偽政權以毀滅性的打擊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二十九軍奮起抗戰。7月28日夜，南苑失陷、二十九軍撤離北平。7月29日凌晨，偽冀東自治政府所在地通縣，卻發生了一件大事—冀東保安隊萬餘人宣布

起義，向日本侵略者發起突然攻擊。

冀東保安隊原名河北特種員警部隊。1933年5月《塘沽協定》簽訂之後，冀東被劃為非軍事區。蔣介石密令河北省主席於學忠另成立五個特種員警總隊，訓練之後開入冀東。於學忠抽調第五十一軍的張慶餘、張硯田兩位元團長和部分營、連軍官，從河北各縣新徵兵萬餘人，組成了河北特警第一總隊和第二總隊。特警總隊長相當於少將師長。第一、第二總隊各轄兩個區隊，每一區隊轄三個大隊。張慶餘率第一總隊駐武清縣，張硯田率第二總隊駐滄縣。第三、四總隊，是把漢奸李濟春從偽滿帶來的偽軍收編後組成的；同時，把冀東土匪胡協五所部收編為第五總隊。這三總隊均無區隊，總共只有八個大隊，實力遠在第一、第二總隊之下。

1935年5月，河北特警總隊奉於學忠之命，進入冀東，分駐通縣、香河、寶坻、順義、懷柔、三河、石門、撫寧一帶。不久，第五十一軍調往西北。因為總隊為地方特警，不算正規部隊，故沒有隨五十一軍同行。於學忠臨離河北時，曾密召張慶餘、張硯田等囑咐：好好訓練軍隊，以待後命。同年7月，接替於學忠主持河北省政府的商震，將河北特警總隊改名為河北保安隊，仍駐守原防地。

1935年11月24日，「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成立之後，由於殷汝耕兵力不多，於是將河北保安隊更名為冀東保安隊（下轄張慶餘、張硯田、李海天、趙雷、李允聲五個總隊），內部人事安排仍維持原狀，歸偽政權統轄。1937年2月，偽滿洲國提供了五百萬元的經費，幫助殷汝耕提高部隊的裝備水準。日本也派出大批軍事顧問，幫助冀東偽政府訓練保安隊和改編民團。

冀東保安隊淪為漢奸政權的統治工具，張慶餘等人自覺臉上無光，但沒有勇氣和漢奸政權決裂。他們密派信使赴保定，向商震請示如何處置此事。商震答說：「目前不宜與殷汝耕決裂，可暫時虛與委蛇，余當負責向政府陳明。」既然國民黨政府尚且允許冀東偽政權存在，張慶餘等人也就以此為由聊以自慰，過著苟且偷安的生活。

殷汝耕賣國投敵的行徑，遭到了全國人民的一致譴責。張慶餘的兒子知道其父在偽冀東政權中任職，認為這是附逆叛國，有辱先人，於是登報與他脫離父子關係。許多冀東保安隊官兵的親友鄉黨，也都視他們為十惡不赦之徒。在全國輿論的壓力下和眾叛親離的局面下，張慶餘、張硯田等人深感不安。但迫於形勢，不敢輕舉妄動，只得暫時忍辱，等待時機反正。張慶餘曾對其妻說：「我的意思現在不便明言，但將來總有分曉。你可轉告兒子，叫他耐心等待，日後看乃父的行動吧！」

12月，宋哲元就任晉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之後，張慶餘和張硯田秘密拜會了他，表明了願意追隨宋哲元抗日的心願。宋哲元囑咐他們要保密，要求他們加緊訓練軍隊，做好準備工作，並送他們一萬元。兩張十分感動，慷慨表示：「今後願一心一意追隨委員長為國效力！」²⁰

七七事變爆發後，張慶餘、張硯田派心腹和二十九軍取得聯繫，向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請示機宜。馮治安說：「現在我軍同日軍是和是戰尚未決定，請你轉告張隊長，暫勿輕動。待我軍開戰時，請張隊長出其不意，一面在通州起義，一面分兵側擊豐台，以收夾擊之效。」馮治安囑咐說，可委派心腹人員與二十九軍參謀長張樾亭經常保持聯繫。張樾亭將冀東保安隊第一、第二總隊編入戰鬥序列。

張慶餘等以「配合皇軍」為名，使冀東保安隊一萬餘人的隊伍得以集結，為起義創造了條

件。7月28日，日軍大舉進攻二十九軍，並令保安隊配合日軍行動。但是駐紮在通縣舊城南門外的冀東保安隊沒有執行日軍的部署，按兵不動。殘忍的日軍轟炸了保安隊的駐地，這一事情激怒了本不甘心當漢奸，早有起義準備的保安隊。

張慶餘、張硯田認為部隊起義時機已到，決定7月28日夜裏12時在通縣起義。夜12時，張慶餘、張硯田聯名通電全國，宣告起義。冀東保安隊關閉城門，斷絕城內交通，佔領電信局及無線電台，並包圍冀東偽政府，活捉了殷汝耕。

張慶餘本想將殷汝耕斬首示眾，但是有人說殷汝耕系何應欽和黃郛的親信，派到他冀東擔任薊密專員，一定有中央密旨，不宜擅自處死，最好押送交宋哲元，轉解中央為妥。但因張慶餘等人並不知道宋哲元已經率領二十九軍撤離北平，因此率領保安隊起義後仍前往北平。保安隊將殷汝耕押送到北平城下後，日軍將其解救。日本駐北平領事館武官今井武夫派北平警察局長潘毓桂打開城門，將其接入城保護起來。在通州起義中，通州日本特務機關長細木繁也被保安隊活捉，後將其擊斃。

在戰鬥中，冀東保安隊殲滅日軍及浪人五百多名，有力地鼓勵了華北軍民的抗日鬥志。冀東保安隊離開通州後，前去追隨二十九軍。到達保定時，由於日軍的襲擊，只剩下四千餘人。張慶餘不久即被蔣介石召赴南京，委以軍政部第六補充訓練處長。後來，張慶餘被任命為第九十一軍副軍長、國民黨軍委會中將參議等職。但張慶餘殺敵宿願未遂，加入國民黨派系傾軋，鬱鬱成疾。1946年，張慶餘退出國民黨軍隊，赴天津定居，直至1963年9月18日因病去世。

這次起義不僅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擊，也給「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以致命性的打擊。通縣起義事件發生後，殷汝耕被迫辭職，由池宗墨接替政務長官的職務，偽政府的所在地也由通縣遷往唐山。1937年12月14日，日本在華北製造了一個以王克敏為首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轄北平、天津、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部分地區。新「政府」的主體是「行政委員會」，基本上都是由北洋時代的舊政客組成。連日本政界有識之士都認為，他們「實際均為人所不齒之流氓地痞集團」²¹。1938年2月，「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被「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吞併，從此壽終正寢，結束了兩年又三個月的可恥統治。

七七事變後，殷汝耕結束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黃金時期」。1943年2月，殷汝耕任偽山西煤礦公司董事長，旋任汪偽政府經濟委員會委員。1941年1月，殷汝耕任汪偽政權治理運河籌備處主任。同年5月，任汪偽治理運河工程局局長。抗戰勝利後，殷汝耕被監禁在南京老虎橋監獄。1946年7月31日，南京高等法院開庭審理殷汝耕一案。7月31日，判處殷汝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沒收。在獄中，殷汝耕終日念佛，似乎看淡了紅塵。當1947年被從獄中提出槍斃時，據說他還「從容不迫」。

冀東偽政府的二號人物池宗墨，也得到了應有的懲罰。1945年12月5日，裝瘋賣傻的他在北京被捕。經關押、審訊一些時日後，國民政府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將池宗墨處以極刑。2003年5月，北京傳來了一則消息：一塊日軍記載「通縣抗日事件」的石碑被發現，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又一證據。原來在北京通州區某工廠，在進行舊房改造施工時發現了一塊字跡模糊的石碑，經過通州區文物所鑒定才知道這是一塊日軍紀念在1937年夏天發生的「通縣事件」的戰死者的「慰靈碑」。

註釋

- 1 J.波義耳著：《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1937-1945)》（上），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145頁。
- 2 張篷舟主編：《近五十年中國與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卷，第224頁。
- 3 南開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編：《華北事變資料選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7頁。
- 4 南開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編：《華北事變資料選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0頁。
- 5 《滿洲報》1935年11月26日。
- 6 《滿洲報》1935年11月26日。
- 7 天津《大公報》1935年11月25日。
- 8 《滿洲報》1935年11月26日。
- 9 《滿洲報》1935年11月26日
- 10 南開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編：《華北事變資料選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頁。
- 11 天津《大公報》1935年11月27日。
- 12 南開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編：《華北事變資料選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0頁。
- 13 南開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編：《華北事變資料選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0頁。
- 14 南開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編：《華北事變資料選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6頁。
- 15 《外交評論》第6卷第1期（1936年1月）。
- 16 《冀東日報》1936年4月16日。
- 17 《冀東日報》1936年4月24日。
- 18 南開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編：《華北事變資料選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9頁。
- 19 南開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編：《華北事變資料選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9頁。
- 20 張慶餘：《冀東保安隊通縣反正始末記》，載《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21輯。
- 21 復旦大學歷史系編：《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資料選輯》，（下）第二分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2-93頁。

何立波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生，裝甲兵工程學院講師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九期 2006年4月29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九期（2006年4月29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